



# 青年融入网络群体的交往效能研究

□ 曲垠姣 杨 峰

**摘要：**当代青年对网络空间和虚拟生活具有密切的依赖共享特质，虚拟交往活动俨然成为其学习、成长的精神需求。然而，青年正处在由不成熟期向成熟期过渡发展的阶段，他们融入网络群体的交往效能兼具正效能和负效能。本文以青年个体为圆心点，按亲密程度关系向外延展辐射的视角，将虚拟交往划分为熟知关系群体交往、轻熟关系群体交往和生熟关系群体交往三种类型，通过建构青年虚拟群体交往效能的理论框架，从三种类型虚拟交往群体的人员构成、交往方式、交往优缺点等进行分类阐述，并对青年交往的困惑、问题和危害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进而提出青年如何规避虚拟交往的负效能，以及提高虚拟交往正效能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青年网络群体；虚拟交往层次；负面效能表现；强化正效能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1.0029

伴随着5G移动通信技术的来临，以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生产为特征的新型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新时代所关注的重要主题。青年群体是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网络用户数量和全国网络用户总量在最近十年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20~29岁网民占网民群体的19.9%<sup>[1]</sup>。这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青年群体成长环境生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对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方面，呈现出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冲突，存在着“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的博弈。在青年交往活动中，网络群体交往一方面给予青年全新的

人际交往体验和感受，有助于提高人际交往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容易使青年遭受不同程度的隐性和显性伤害，如负面信息判断、语言讽刺挖苦、人格不被尊重等软伤害，再如经济欺诈、被诱导赌毒、犯罪等硬伤害。因此，如何有效发挥虚拟交往的正效能，规避虚拟交往的负效能，是青年虚拟交往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虚拟交往群体的现状剖析，在结合青年虚拟群体交往困惑、问题和危害的基础上，提出青年有效虚拟交往的建议，将利于促进政府、高校、家庭和社会采取得力措施并建立长效机制，进而增强青年“个人醒悟”和“他人警醒”的影

响效能，打造青年成长、成才的良好交往环境。

## 一、青年融入虚拟群体交往效能的理论分析

### 1. 核心概念诠释

(1) 人际交往的内涵及其分析。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符号或肢体等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代表人类归属于其他人或群体的基本需要，构成了人类交互联系的社会基础。结合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人际交往是主体基于交往需求，与交往客体建立人际交互关系的过程和活动。人际交往主体作为社会交往关系的发起者，决定着交往关系的建立和交往客体的选择，能够基于思想交流、利益交换、互助合作等交往需求，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人际交往活动。

(2) 对交往群体定义的解释。人际交往客体以数量特征为分类依据，能够划分为交往个体和交往群体两种形式，交往个体作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的个人，与交往主体之间形成点对点的关系。而交往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交往个体集合而成的规模性交往，是交往主体按照主观感受或客观依据对交往个体的归类，与交往主体之间形成的是点对面的交往关系。交往群体的构成具有同类质性、同方向性的特征，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基于共同目标、共同需求、共同兴趣、共同层级等共性因素聚合而成。

(3) 对虚拟组织特性的认识。虚拟组织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网络平台、人工智能产品为依托的人机一体化组织<sup>[2]</sup>。这种组织具有互动性、吸引力、公平性、无边界性和自由性的特征，内部的成员以网络符号代替现实身份，不存在身体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地域属性等条件限制；以平等独立身份建立起复杂的立体交互式网络关系，能够有选择性地加入符合自身偏好的组织，充分体现纳入或退出虚拟组织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4) 自我效能与虚拟交往效能。自我效能概念最早来源于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从事某种行为并取得预期效果的能力，是个体对自我有关能力的感觉<sup>[3]</sup>。谢晶首次将自我效能感引入人际交往领域，提出人际交往效能感，认为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之前，会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交往目标进行判断<sup>[4]</sup>。笔者认为在网络时代，虚拟交往效能就是指交往主体与交往客体在网络交往中自我感受的心理满足或其他收获效果。

## 2. 研究框架的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人际交往理论，二是补偿心理理论，以此来分析和阐述青年虚拟交往的动因和心理需要。

(1) 基于人际交往理论分析虚拟交往的动因。人际交往理论对人性的相关假设，认为人具有“社会人”属性，这种社会属性的获得源于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个体在生存技能方面的有限性，使其无法脱离群体而独立生存，必须获得来源于社会群体的支持，因此，个体必须建立起与群体的互动关系，在向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的同时，从中获取所需的生存和发展要素；人具有“复杂属性”，认为人的发展动力源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效果。其中，人际交往与沟通是人类精神生活得以满足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给予个体充分的安全感、支持感和归属感。

(2) 基于补偿心理理论探析青年虚拟交往的精神需求。根据补偿心理理论的基本观点，个体补偿心理源于心理平衡机制的运行结果，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总会出现心理上的偏差和落差，如果个体在某种社会交往活动中没有实现足够的期望和需求，就会产生持续性的不适感和不满足感。为了补偿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个体就会寻找能够补偿这种不满需求的实现途径，即发生需求满足方式上的“移位”。由于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在需求满足层面处于互补关系，因此，当现实交往无法充分满足个体交往需求时，个体就会将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移位到网络世界的虚拟交往之中。

## 3. 青年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分析

青年交往是促其学习学业、心理与情感发展、价值观形成、社会成熟度提高的重要途径，是政府、家庭和社会必须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高校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大格局。青年的现实交往是大家非常重视的课题，在此不再赘述，而青年虚拟交往是当代高科技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青年建立交往关系的又一个新路径，是个体社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两个交往范式”都是政府、家庭和个人需要理性对待的问题。

(1) 什么是青年的现实交往。实际上，依据青年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维度，以及人际交往发生路径的差异，可以将青年交往类型划分为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两种交往方式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影响青年

的成长阅历,以及价值观、社会观和生活观的发展。现实交往即传统交往,是现实世界中交往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直接性交往,这种交往发生于真实的物理空间环境,其主体和客体都是实体存在的人,发生路径为“主体—客体”,即交往主体通过直接“面对面”的表达手段,如口头交流、肢体语言等,向交往客体实时传递交往信息,无须凭借身体器官外的任何媒体中介。这是人类长期在生活、生产实践中的基本交往方式。

(2) 如何认识青年的虚拟交往。为什么青年热衷于虚拟交往,虚拟交往的类型是什么?虚拟交往是指交往主体凭借网络技术中介与交往客体建立的间接性联系,存在于由数据信息构成的超时空、非物理化的虚拟空间之中,即通常所称的“赛博空间”“网络空间”<sup>[5]</sup>。这种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仅仅是现代技术塑造出的模拟情境,这种交往的发生路径为“主体—网络—客体”,是交往主体利用网络技术中介间接向交往客体传达交往信息的过程。虚拟交往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迅速快捷。互联网以光纤作为传递介质,能够实现数据信息的高速传递和共享。二是信息量大。网络存储信息的无限制性,可以使人随时获取所需的交往信息。三是时空方便。跨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在交往双方间建立起多样化的联系,可以使人极大降低人际交往成本。四是保护隐私。网络身份的匿名化和符号化特征,便于青年将现实身份信息隐匿在虚拟网络的屏障后。五是平等自由。在虚拟交往中以平等身份接触异质性群体,能够获取多元化的知识和信息,形成更为完备的社会认知体系;以自由身份选择符合自身要求的同类质交往群体,实现交往双方真实感情的有效输入与输出,获取更多归属感、安全感和支持感。六是随机动态性。虚拟交往能够满足青年的猎奇兴趣,使青年有机会接触到毫不知悉的陌生群体,进一步激活交往主体寻求交往对象的心理动机,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虚拟交往,参与过程的动态性特征明显。

根据“差序格局”对交往关系的相关阐述,个体在建立社会交往关系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会自动将高关系先赋性和高关系交往性的他人包容进入自我的边界,形成所谓“自己人”即“我们”,而将低关系先赋性和低关系交往性的他人排斥在自我边界之外,形成所谓“外人”即“他们”<sup>[6]</sup>。因此,在青年“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关系序列中,依据虚拟交往群体在关系序列中的排列次序,可以划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交往方式是自然、自由选择的行为,其功能和作用是在个体与群体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参与交往的个体或群体的聚、散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无论如何变化,其根基一般都源于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

## 二、青年融入虚拟群体组织的交往效能

基于虚拟交往群体的三种类型,下面将集中从交往对象、特征、需求、优劣势等方面对熟知关系群体、轻熟关系群体、生熟关系群体进行依次分析,把握三者交往情境的不同特质。

### 1. 虚拟交往群体分类与差异性分析

(1) 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熟知”亦称为“熟悉”,是交往双方在表面知晓基础上,对内在规律和实质的进一步把握,意为“从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sup>[7]</sup>。熟知关系群体可以理解为具有高关系先赋性和高关系交往性的“自己人”,属于相互卷入彼此隐私生活的交往体,表现为人际关系双方真实情感的互动,彼此间形成了很高程度的信任感和稳定感。而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是指交往主体与客体在虚拟组织内建立的交往关系,往往依附于现实中的关系基础,是对现实交往的重要补充,实质为深层次交往。青年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对象主要包括亲人、教师、朋友、男(女)朋友四类,建立在现实已有的血缘、业缘、利益、情感、地域等关系基础上。其优势在于,青年对熟知关系群体的身份、性格、品质等私密性信息具有较为完备的认知,交往双方间已建立起较充足的信任和支持关系,交往关系的内容也多涉及现实情境中的要素。其劣势在于,熟知关系群体在数量和范围上具有有限性,青年在与这类群体的交往中,难以接触多元的交往群体和丰富的信息资源,限制对知识和信息的充分获取。同时,青年在熟知关系群体交往中容易受到身份、层级、职业等现实条件的限制,形成过重的角色包袱和角色压力,在特殊情景下,可能存在对熟知亲友过度的责任感,导致真实情感的扭曲,难以直接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一种异化的矛盾心理特征。

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需要建立熟关系群体现实身份与网络虚拟身份的对应关系。以微信、QQ等网络交往软件实名化和符号化形式象征实际身份,借助

网络平台中文字、表情包、音频和影像等各种各样的交往介质,模拟和还原现实交往情境,与交往客体间建立起跨时空的交往关系,从而充分发挥网络交往对现实交往的重要补充和辅助作用。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需求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跨时空交往需求。青年阶段是与亲人产生空间距离的起始阶段,同时也是青年情感需求旺盛的时期,渴望时时刻刻得到亲人的关怀和支持,而虚拟网络交往建立起跨时间和异空间的交往,能够满足青年的情感需求。二是高效便捷交往需求。熟知关系群体是青年交往时间最持久、交往频次最高、交往关系最紧密的交往对象,交往双方会因现实关系基础的存在而产生不间断的关系依赖和需求,而网络交往所具有的实时性和便捷性特质,能够实现交往讯息的瞬时有效传达,提高熟知关系群体虚拟交往的效率和效果。

(2) 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轻熟关系”意为小范围、浅程度的接触关系,既非“无所不知”的熟关系,又非一无所知的生熟关系,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轻熟关系群体可以理解为处于“我们”和“他们”关系夹层间的群体。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通常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展开,是交往双方基于交往需求,如爱好、兴趣、利益、目标等形成的同质性交往,其维持时间往往取决于交往双方对这段交往关系的主观价值判断,会因交往价值的变化持续发展或者随时终止,实质为浅层次交往。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熟知关系的淡化。青年与熟知关系群体交往基础的变化,以现实交往为主导的交往方式让渡为网络交往方式,表现为交往双方对彼此信息的知悉程度逐渐降低,联系频率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对同类质群体的选择。一是文化属性相近。青年往往会选择具有相同文化素养和文化程度的群体作为学习交往对象。二是社会属性相近。青年将与自身年龄、身份、阶层相似的群体作为经历交流对象。三是自身属性相近。在共性特质如相同目标、相同性格、相同兴趣、相同爱好、相同习惯等吸引下,青年会与上述特质对象建立起较长时间的互动关系。四是异性特质吸引。青年对爱情好奇和渴望驱使其对异性保持网上联系和关注的状态,如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高颜值网红的支持等。

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具有以下优势。一方面,自由选择同类质群体。交往双方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建立的网络互联关系,能够对交往对象某部分特质形成较为真实的认知。在同类质群体的交往中,交往双

方更容易形成一致性话语体系,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鼓励达成一致目标、分享兴趣话题、交流日常经历等,这些都能使青年获得归属于同类群体的安全感和支持感。另一方面,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找寻同类质群体。在免费虚拟交往平台中,建立起不同地域间的人际交往关系,无须青年额外支付平台使用成本和交往费用;运用高效搜索、算法推荐找寻同类质群体。根据青年的个人信息和定位,提供高效找寻轻熟关系群体的便捷搜索通道,并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向青年定期推荐可能感兴趣的用户群体。但轻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也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青年对这类交往对象的知悉仅限于同类质属性部分,交往基础也仅限于同类质属性,认知的局限性及关系的易变性都容易使青年受到情感上的错付和损害。二是青年可能基于多种同类质属性与多个群体同时建立轻熟关系,个体时间和精力有限性必然使得青年减少对其他交往方式的投入,导致与这类群体交往所获的交往收益低于预期。三是如果青年选择的同类质群体属于社会危险边缘群体,对这类群体的归属选择无疑是对错误面的纵容和无限放大,如果把这些人群视为知己而过度信任,则易产生助纣为虐的负面交往恶果。

(3) 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浅显地说生熟关系就是陌生人关系。“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sup>[8]</sup>。陌生关系群体意味着互不了解、互不关心、相互疏离的人群,属于低关系先赋性和低关系交往性的“他人”。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表明,交往主体与交往客体在互不知悉情况下形成初步接触。所以,这类交往实质为表层次交往。青年的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对象包括大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复杂群体。只要交往主体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就不可避免与生熟关系群体建立起各种交往关系。青年与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的情境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针对偶发事件建立起的共感性交往。青年具有使命感和正义感,当网络平台中出现重大的舆论事件,就会引发青年产生与舆论方向相同的情感共鸣,使青年与本无交集的陌生群体在同一网络平台上进行观点评论、点赞转发等一致性行为。二是基于网络共同活动形成的临时性交往。众多网络软件的体验需要以团队组合的形式完成,这些软件通常会配备随机匹配的通道,促成青年与生熟关系群体临时性的交往活动,如大型网络游戏活动组成的临时性队友关系等。三是规律性活动形成的印象性交往。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习惯性日常活动

会使其高频率、高概率接触到同习惯的群体，形成网络“眼熟”印象性交往，如按时完成打卡性任务、定期定点收看网络节目等。

生熟关系群体虚拟交往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隐私保护。网络空间中生熟关系群体的交往双方能够有选择性地隐匿现实身份信息，形成平等、无利害冲突的匿名交往关系，从而保护青年的身份隐私，促进交往双方真实想法的有效表达。二是庞大信息量的获取。生熟关系群体的异质性构成，方便青年获取来源丰富和内容多元的社会信息，形成对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认识，突破现实条件对思想观念的限制，促进青年社会认知体系的及时更新。但是，劣势也很凸显，青年与这类群体的虚拟交往始终属于低质量化的泛社交和浅社交，并不能为青年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当大规模的生熟关系群体聚集同一网络平台时，容易发生群体极化和群体同化现象，使裹挟在大众舆论中的青年丧失思辨理性，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此外，生熟关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可能使青年接触到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信息，陷入对已有知识观念体系的质疑状态，影响青年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

## 2. 当前青年虚拟交往的负效能分析

虚拟网络交往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在虚拟网络交往的负能量方面主要是诈骗、网络暴力等。“从2019年网络诈骗主要类型来看，金融诈骗、游戏诈骗、兼职诈骗成为举报量最多的三大诈骗类型。网络赌博诈骗、交友诈骗和金融诈骗则成为人均损失最高的三类诈骗。举报量最多、人均损失又遥遥领先的金融诈骗正迅速蚕食着受害者的钱包。18岁至22岁人群举报量最高，占比23%，该年龄段人群多为大学生。23岁至27岁、28岁至32岁人群，则分别为举报量第二、第三人群”<sup>[9]</sup>。可见，青年被诈骗的占比呈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体现了网络交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此外，网络暴力是青年虚拟网络交往面临的又一个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近三成青年曾遭遇过网络暴力辱骂。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89%”<sup>[10]</sup>，且有数据表明，全球70.6%的15~24岁年轻网民正面临着网络暴力、欺凌和骚扰的威胁<sup>[11]</sup>。由此可知，虚拟网络交往存在较为严重的人身攻击，使青年的人格和精神受到打击，势必影响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1) 虚拟交往的潜在负效能表征。所谓虚拟交往的潜在负效能往往是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下的行为表现，即作为青年本人的主观理念和价值观尚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是一种“没过脑子”、缺乏深思熟虑、意念程度较低所伴随的不自觉行为状态；也是青年在虚拟交往过程中受到的不易被发现却是客观存在的负面影响，大多表现为受到某种心理效应的暗示，使交往主体的思维观念或行动迹象发生不自觉的动摇或转变。由于潜在负效能对交往活动的影响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程度较为平缓，以及影响尚处于质变前的量变阶段中，因此，这种潜在负效能并未引起交往活动的实质性变化，往往不易直接被交往主体所察知。

一是茧房效应。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认为人们在信息领域中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茧房”中的现象<sup>[12]</sup>。青年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初期，对人际交往对象的选择和关系处理仍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经验，容易不自觉地陷入自己编织的人际关系“茧房”中，只选择与相似群体建立交往关系，而与差异性群体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排斥。

二是回声室效应。同类质群体交往容易使青年陷入类似封闭回声室的自我封闭隔离处境中，处于室内的个体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或已经听到的声音，异质化观点几乎全被排除到室外。在这种效应的潜在影响下，青年极易成为偏激信息的持有者，对事物也缺乏完整理性认识，只选择在符合自身偏好的关系圈子里永驻，而与异质圈子保持隔绝甚至对立。

三是从众效应。虚拟交往群体中的青年在群体的压力或引导下，会不自己、不自觉地与大规模群体一致的方向变动，全然丧失独立思考或理性思考的能力。在这种心理效应的影响下，青年渐渐沦为极化群体实现目标的利用工具，产生冲动性思维或盲动，做出人云亦云的反应，沦为乌合之众的一员。

四是惯性效应。虚拟交往具有泛社交化和浅社交化的特征。如果青年在这类交往中养成习惯性的交往思维定式，这种本该出现在虚拟群体交往中的思维或行动就会因惯性效应出现在现实交往中，致使青年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错位，虚情假意、表面应付等低质化交往问题，也常发生在大学生现实交往情境中，从而引发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

(2) 虚拟交往的显性负效能表征。青年虚拟交往的显性负效能是比较凸显的外在表现，就本质而言，显性负效能是在青年观念意识形成条件下的外在行为

表现,即青年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已经固化并稳定下来的思想理念,是潜在负效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质性层面产生的一种反映。这种显性负效能在影响程度、范围、时间长度层面都远超潜在负效能。笔者初步调查和研究发现,虚拟交往的显性负效能表征大致能够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迷茫彷徨行为。虚拟交往致使青年安全感失衡,陷于困惑、怯懦、彷徨、失败、恐惧的困扰中,不相信亲情、爱情、友情等真实情感的存在。笔者调查发现这类青年占比达到31.4%,而且与年龄和个性以及生活阅历有关,他们很容易进入自我封闭空间,自我封闭心理,依赖轻熟虚拟交往生活。

二是虚无主义行为。沉迷于虚拟空间内的交往情感,崇尚和追求文学社会浪漫的生活或动物界的所谓自然方式,沉浸在音乐或不停歇的游戏遐想中度日;“见光死”的宅男宅女,产生宗教迷信倾向,寻找所谓的“自我成就感”,即自我中心主义的成就感,忽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类青年约占被调查对象的7.6%左右,他们易出现不负责任、漠视规则、淡漠道德、缺乏团队意识等不良交往现象。

三是自私腐化行为。盲目崇拜国外糜烂生活,陷入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厌恶奋斗拼搏的人生。满腹牢骚成为一种开口话题,此类青年大约占被试人员的7.1%左右,往往在埋怨周围一切、埋怨家庭和社会的消极状态中生活。

四是自我堕落行为。不肯参与社会活动和工作,对人生事业无所追求,缺乏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能力,成为社会纳税人负担的“无业游民”,成为家庭劳动中的“懒汉”、经济上的“啃老族”和社会中的“寄生虫”。这部分青年占比约为4.7%,其行为表现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修养的淡化或消失。

五是异化变态行为。具有愤世嫉俗情绪,渐生厌世和自杀情绪,或反社会倾向,甚至走向社会犯罪等表现,这种少数青年人群约占0.7%左右,尽管数量较少,但其带来的潜在危害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潜在负效能还是显性负效能,都是虚拟交往环境下个体行为异化的表现,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使个体偏离正常人生轨道、加重家庭负担,以及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青年需要有效提高自身规避负效能的能力,时刻关注自身状态变化的同时,积极寻求他人对自身变化的感知,做到防微杜

渐,争取把问题和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虚拟交往的潜在负效能经由量的积累质变为显性负效能。

### 三、提升青年虚拟交往正效能的建议

#### 1.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青年虚拟交往动机、对象、方式的选择层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能够引导青年遵守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寻求优质的虚拟交往群体,能够规范青年合理安排虚拟交往的时间,成为控制网络使用的主人;能够推动青年自觉维护虚拟交往的和谐环境,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网络公民。青年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首先需要青年辩证看待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认识到个体必须对社会尽职尽责,只有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其次,青年所在的家庭和学校应该担负起教育和引导的积极作用,坚持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最后,青年应该树立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发挥正确意识对行动的积极引导作用,自觉维护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良好秩序,推动社会发展。

#### 2. 学会思辨和识别真伪

保持思辨的独立意识。青年与同类群体建立虚拟交往关系时,需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避免受到“茧房效应”“回声室效应”和“从众效应”等潜在负效能的影响,在群体关系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头脑,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理性做出有效抉择,避免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乌合之众。同时,需要有效辨别虚拟交往的成本与收益,避免陷入泛社交和浅社交的错误交往格局,尽量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互尊互重、互惠互利的交往关系中。

具备识别真伪的慧眼。虚拟网络用户准入门槛较低,在群体人员构成层面具有异质性和复杂性,不免存在与社会发展方向相悖的个体,这就需要青年在虚拟交往中时刻保持警惕之心,有效识别网络榜样和不端分子。此外,部分网络用户利用网络身份虚拟性的特质塑造出人为的虚假形象,达到骗取感情或利益的目的,因此,需要青年群体在进行有理有据的考证基础上,对网络环境中的真伪做出科学判断。

#### 3. 有机融合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

青年需要有机融合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首先,需要明确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辩证关系,网络人际

交往是对现实交往的补充, 最终要回归到现实交往中去生活和工作, 现实交往才是人际交往关系有效发展和维持的真正途径, 因此, 青年要珍惜现实人际交往的各种机会, 将时间与精力更多投入到高质量的现实交往中, 培养现实人际交往所需的情感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进而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优势。其次, 有效规避虚拟交往和现实交往的劣势, 集中融合两者的优势, 将现实交往的直接性与虚拟交往的间接性结合。最后, 虚拟网络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致力于对现实交往情境的无限接近式模拟和塑造, 实现技术壁垒的突破, 真正使虚拟网络交往技术具备现实交往的融合优势, 青年要真正学会在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的

角色切换, 不断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美好人生。

总之, 当今青年的虚拟交往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何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科学处理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的关系, 充分发挥虚拟交往的正效能, 是政府、家庭和社会理应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曲垠姣: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实习研究员, 博士

杨峰: 北京科技大学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程旭辉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9/P020200929546215182514.pdf>, 2020-09-29.
- [2] 周若辉. 虚拟与现实——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方式 [M].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
- [3] 班杜拉. 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 [M]. 林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 谢晶. 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的初步编制与分析 [D]. 太原: 山西大学, 2004: 9-25.
- [5] 蒋雪梅, 龚彬. 大学生社会交往及能力培养研究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 [6] [7]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9] 360. 2019 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 [EB/O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996727.html>, 2020-01-14.
- [10] 中国新闻网. 报告析网络暴力: 近三成青少年遭遇过网络暴力辱骂 [EB/OL].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8-12/26/content\\_74314121.htm?f=pad&a=true](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8-12/26/content_74314121.htm?f=pad&a=true), 2018-12-26.
- [11] 网易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国际互联网安全日呼吁采取行动, 帮助正面临网络欺凌与骚扰的近七成全球年轻网民免受其害 [EB/OL]. <https://jiankang.163.com/19/0212/11/E7QG5VE30038950F.html>, 2019-02-12.
- [12]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M]. 毕竟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上接第 95 页)

- [6] 曾东霞. “斗室星空”: 农村贫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经验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7): 38-43.
- [7] 林晓珊. 境遇与体验: 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7): 15-23.
- [9] 熊和妮, 王晓芳. 劳动阶层家庭语言的教育力量——基于农村大学生的叙事分析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47-55.
- [10] 董海军. 成长的驱动与机会: 底层苦难经历的自我民族志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7): 24-29.
- [11] 余秀兰, 韩燕. 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 (2): 8-16.
- [12] [15] [16] [17] [25]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48, 124, 158, 146, 263.
- [13] [19] 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8, 229.
- [14] [23] 程猛, 吕雨欣, 杨扬. “底层文化资本”再审视 [J].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8 (4): 52-59.
- [18] 刘谦, 陈颖军. “寒门出贵子”现象的理论再探究——聚焦学业过程与社会文化要素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9 (4): 158-164.
- [20] 谢爱磊, 洪岩璧, 匡歌, 等. “寒门贵子”: 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 16 (4): 45-64.
- [21] 朱斌. 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 ——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公平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8 (1): 142-168.
- [22] [26] 布尔迪厄.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M]. 刘晖,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63, 115.
- [24]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95.
- [29] 秦惠民, 李娜. 农村背景大学生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大学场域中文化作为资本影响力的视角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 12 (4): 72-88.